

## 焦点话题

## 部分政协委员热议互联网金融

## 不应把余额宝与银行对立起来

□本报记者 官平 梅俊彦



Getty图片 制图/韩景丰

闫冰竹:  
加强监管迫在眉睫

□本报记者 陈莹莹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2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随着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其风险防范问题日益凸显,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稳定金融市场秩序迫在眉睫。他建议,应理顺各类互联网金融模式的业务范围,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主体、监管对象和监管范围;将互联网融资纳入社会融资总量,建立完善的互联网融资统计监测指标体系。

他还建议应尽快设计并推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存款保险制度,建议实行强制性存款保险制度,使之覆盖所有存款类金融机构。先期设立存款保险基金,同时实行差别风险费率机制。

## 互联网融资应纳入社会融资总量

闫冰竹表示,建议将互联网融资纳入社会融资总量,建立完善的互联网融资统计监测指标体系。针对互联网金融活动交易的快速、频繁和虚拟性等特点,监管部门应通过加强信息技术非现场监管建立有效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理机制。针对跨国互联网金融活动,监管部门需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监管合作与协调。

他还建议,应从法律法规层面加大对互联网金融的立法力度。借鉴国际经验,从三个层面加大力度:一是梳理与互联网相关的现有法律法规,结合互联网金融特点加大基础性立法工作,建议明确互联网金融交易主体的责权利、行业准入门槛、交易行为规范。二是修订和完善互联网金融的配套法律体系,建议修订现有法律体系中对互联网金融不适用的条款,完善对互联网金融犯罪责任追究的法律规范。三是补充制定有利于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行业法规,建议制定互联网金融公平交易规则以及安全法规。

同时,加快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互联网金融监测及消费者权益保护。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健全企业和个人信用体系;按照“特定非”(指房地产、贵金属和珠宝流通、拍卖等洗钱高风险行业)的反洗钱监管要求,将互联网金融纳入反洗钱监管;加强互联网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切实保障消费者利益等。

## 应推出中国特色存款保险制度

闫冰竹还表示,由于我国国情复杂,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设计并推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存款保险制度,对促进我国金融体系稳健运行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闫冰竹建议实行强制性存款保险制度。强制性的存款保险一方面可以有效地抑制金融机构参与存款保险时的逆向选择问题,保证参加保险的银行数量,扩大保险基金的规模;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市场竞争的公平性。

另外,先期设立存款保险基金,逐步从“付款箱模式”向“成本最小模式”或“风险最小模式”过渡。我国存款保险可以实行分步走,在存款保险制度刚推出之际设立一个存款保险基金,待到未来条件成熟时,再设立完全独立的存款保险公司。在存款保险制度职能设计上,由初始阶段仅仅具有的“付款箱”功能,逐渐增加监管介入力度,包括完善风险处置机制与审慎监管权,即运用多种风险处置工具和机制实现处置成本最小化,将损失风险或损失程度降到最低。

闫冰竹建议,应明确存款保险基金来源,建议实行比例赔付政策。在存款保险基金成立之初,国家可投入一定数量的初始资金,但主要还是依靠各投保金融机构定期缴纳的保费。在赔付原则上,建议按照最低90%的比例进行赔付,使居民存款的绝大部分都能得到存款保险制度的保障。

同时,实行差别风险费率机制。全面考虑各投行资本充足、资产质量、管理能力、流动性等方面指标情况,综合进行信用评级,根据评级结果确定各投行的费率水平,评级较高的银行则费率相对较低。

眼下火爆的“打车软件”把互联网金融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有关互联网金融的话题引起一些全国政协委员热议。全国政协委员、银监会原副主席蔡鄂生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不要把互联网金融与银行对立起来,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新事物。此外,有全国政协委员呼吁,要尽快建立完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

## 互联网金融处于“三无状态”

在较短的时间内,电商、搜索引擎和社交平台等互联网企业纷纷涌入金融领域,国内已经出现支付、融资和理财三种互联网金融模式,一些标志性的互联网金融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副总经理谢卫表示,余额宝崛起是2013年互联网金融的最大事件,它推动了货币基金进入寻常百姓视野,但其初始宣传基本忽视了货币基金的风险特征,直接将收益冠以活期储蓄的若干倍。

“对这一违背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的违规行为,监管当局开始没有做出反应,给市场预期带来了困扰。”谢卫表

示,对某基金公司和某网站合作推出年化收益率远超市场的理财产品,监管部门公开表态称其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下一步将根据报送的书面材料对该业务的合规性予以核查。此后,监管部门再度表态,该类理财产品销售各环节均由基金公司完成,互联网公司只负责流量导入,认为该理财产品的销售并未出现违规。

谢卫指出,目前互联网金融行业尚处于无门槛、无标准、无监管的三无状态。这导致部分互联网金融产品(尤其是理财产品)游走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稍有不慎就可能触碰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非法集资”的红线。

## 不能按照银行的办法来制定规则

互联网金融是一个新事物,它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打车等。“嘀嘀打车”和“快的打车”之间的明争暗斗让消费者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但是“胶着”状态的背后,如何进行监管也是一个重要课题。

蔡鄂生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互联网金融有发展的过程,从央行给第三方支付发牌照一直发展到今天,它需要规则。至于转移了谁的存款,不要把支付宝、余额宝与银行对立起来,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新事物。

蔡鄂生表示,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需要大家去研究,首先研究它的规律,如果按照传统银行的办法来对它制

定规则,可能会有问题。不能简单的和机构类比来定规则,要从市场秩序以及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整体大局来制定规则。

蔡鄂生说自己并没有把钱放在余额宝里。但他表示,银行也不是万能的,每一类机构都有功能定位,需要搞清楚余额宝最终定位在金融领域要解决什么问题。

“利率市场化本身是客观事物,也是改革方向,是市场发展的趋势。余额宝是利率市场化的一个反映,要看整体利率市场化的进程,才能把这些问题看得更清楚。”蔡鄂生说。

## 强化互联网金融公司资质管理

部分全国政协委员提出,要对互联网金融加强监管,建立完善互联网金融法律法规体系。

谢卫在其《关于继续推进互联网金融规范发展的建议》的提案中表示,应鼓励互联网企业在配备与传统金融机构同样水平的人才、设施、风控标准后申请金融牌照,严格互联网金融公司的资质管理,对于已取得金融牌照、资质优良、有信誉保障的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创新行为给予积极鼓励和扶持;对于未取得金融牌照而突破监管底线的企业,须给予重罚,进入监管黑名单,甚至行业禁入,若干年内不得申请相关资格。

他还建议,要进一步完善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法规体

系,无论是宏观层面的互联网金融立法,还是相关的互联网金融基础性法律,以及配套的互联网金融技术环节的法规和标准制定,都应加快建设完善。

民革中央《关于加快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提案》也提出,要根据互联网金融兴起后“小额、分散”的特点,监测市场整体状况,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监管部门可尝试建立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基础的监测分析系统,通过与具有数据规模优势的外部平台合作,按风险类别锁定主要交易对手群体,及时掌握其总体财务状况和流动性水平,以实现对整个行业风险的宏观和前瞻性把握。

## 吴焰:建议设立互联网金融投资者保障基金

□本报记者 费杨生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焰建议,对于从线下搬到线上的互联网金融业务,要严格遵守线下传统金融业务的监管规定,统一监管标准,避免监管套利,确保监管的一致性。对互联网金融产品补贴式营销、承诺或夸大收益的做法进行窗口指导,维护金融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在《关于规范互联网金融保险发展有效防范化解风险

的提案》中,吴焰还建议,构建有效的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根据不同互联网金融商业模式和产品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程度,实行分类监管;加强互联网金融投资者权益保护,加强互联网金融产品注册登记和强制性信息披露,完善互联网金融投资网络投诉渠道,健全投诉受理机制,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探索设立互联网金融投资者保障基金,完善基金的筹资、运作与救助机制,构建互联网金融风险管理的最后一道防线。

## 李占通:防控风险不宜因噎废食

□本报记者 周文天

3月2日,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占通表示,互联网金融是当前最具创新活力和增长潜力的新兴业态,是新时期我国金融改革创新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可以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李占通委员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有效利用互联网金融工具,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建议》的提案。李占通认为,因为支付结算、资金融通都可以在网络上直接实现,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信息不对称程度大幅度下降,信息的获取和处理成本大幅下降,资源配置的效率得到大幅提升。李占通对互联网金融提出了五方面建议:

首先,有关部委(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等)及地方政府应敏锐把握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契机,在资金、规划、政策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引导互联网金融作为传统金融的补充,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创新服务。目前,天津等地已经出台支持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政策,但力度还很不够,希望政府能投入更多的资源给予支持。

其次,支持互联网金融改造传统金融业。金融应为产业服务,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突出,互联网金融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金融的运转效率,对传统金融的升级和改造意

义重大。

第三,采取在发展中规范的思路,对互联网金融给予较宽松的监管政策,发挥市场的作用推动行业自律,逐步建立诚信体系,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诚信体系,建立行业约束以及行业风控水平能力,在严防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对互联网金融出现的风险按个案处理,不宜因噎废食。

第四,加强风险控制。须在信贷技术上有所创新和突破。通过虚拟世界的行为信息、身份与实体世界的行为信息和交易信息结合起来,将这种非结构化的数据与信息抓取分析出来。这就是信贷技术的创新。通过大数据、评分卡、决策引擎,使得海量用户的交易信息与行为信息能够加以发掘。信贷技术的创新在互联网金融中更为重要。

最后,未来中国互联网金融创新的走势一定是线上线下相结合,实体体系与虚拟体系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运用相关金融服务手段,对初创期、成长期科技型中小企业所拥有的专利、技术、工艺、配方等无形资产进行资本化,形成服务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综合科技金融服务平台。通过这一平台,最终实现不同发展阶段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形成相适应的融资服务机制,积极推动符合科技企业特点的多层次信贷产品和金融服务创新,最终实现线上线下的有效结合。

## 上市公司访谈

东方电气董事长王计:  
今年水电或迎来“最后的晚餐”

□本报记者 王荣



全国政协委员、东方电气董事长王计日前接受中国证券记者采访时表示,可再生能源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需要经历艰苦的探索之路。“十二五”期间内陆核电很难有新项目获批;在巨大的能源需求压力下,今年大水电或许将迎来“最后的晚餐”。对于国企改革,王计指出,不管是混合所有制还是职工持股,关键的问题是要激发企业活力,最好用一企一策的办法来找到合适的改革路径。

## 内陆核电难有新项目获批

中国证券报:日前国家能源局印发了“十二五”第四批风电项目计划。业界反映,风电行业下游需求回暖,东方电气日前也签订了瑞典布莱肯风电设备成套供货合同。如何看待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发展前景?

王计:可再生能源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在一段时间内,风电市场出现了投资过度,东方电气由于没有过多参与风电市场的恶性竞争,使得东方电气在风电设备领域的排名由第三跌至第九。

风电设备是短平快产品,不像火电、核电有较长的周期,企业难以预估风电、光伏设备未来的需求,新能源发展还有一个艰苦的探索之路,需要突破技术、资源等问题。

中国证券报:业界认为,我国未开工的大水电项目所剩不多。今年水电行业的机会如何?

王计:业界都说,今年是大水电的“最后的晚餐”。今年重点是长江沿线水电设备的供应,同时乌东德、白鹤滩水电站的装机容量有可能再创新高,这也可能会带动公司相关设备的销售。我认为,这两个项目的启动时间不会太久。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而风电、光伏等新能源的发展目前并不能满足能源需求。在水电持续下降,核电短期没有新建的情况下,需要建设大型水电站。

事实上,除高铁外,水电是中国全球“推销”的拳头产品之一。另外,发改委年初明确,今后新投产水电站,跨省跨区域交易价格由供需双方参照受电地区省级电网企业平均购电价格扣减输电价格协商确定,这意味着上调水电上网电价,刺激了水电发电企业的积极性。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核电市场的前景?

王计:“十二五”期间很难有内陆核电获批,只能争取更多的沿海核电。目前,核电虽走出了福岛核危机带来的阴影,但无法摆脱福岛核危机带来的影响。内陆核电的争议很大,但是中国不发展核电压力很大,核电厂如何用新的安全理念,用产品的质量,用安全的运行化解人民心头的疑问,这个工作要花很长的时间。

## 国企改革需一企一策

中国证券报:东方电气是国务院国资委直属的中央企业,在国企改革的浪潮中,东方电气也走在浪尖上。去年12月11日,国务院国资委原则同意公司发行不超过40亿元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总体方案。有人认为,一旦实行转股,国资将由绝对控股变成相对控股。未来东方电气的改革之路将会怎样?

王计:目前对于国企改革道路讨论较多,国企改革方式不管是混合所有制还是职工持股,关键问题是激发企业活力,国企最大问题是机制不活,活力不足。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之后,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过去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想干但不敢干的原因,最主要的是环境问题。以往如果推进制度改革,促进机制的革新,要触动很多问题,比如社会接纳的环境条件,职工的思想对改革的接受和推动都很重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改革方向后,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人们思维的方式都要做一些调整,这就促成改革思路的产生,让国有企业在下一步机制改革过程中有积极性。

在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无论是混合所有制还是内部上下制度的深化改革,亦或是经理人以及管理者的管理方式都会积极推进,但需要一企一策的办法。大型企业可能会有更多自主权,根据企业的自身特点、竞争情况、企业文化来寻找解决的办法。

现在还不能给改革划定时间表。因为改革牵扯到人、社会环境、政策支持、合理合规、职工接受、市场资源匹配等问题。

## 贾康:消费税改革料有动作

□本报记者 王荣 梅俊彦 官平

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贾康3月2日表示,互联网金融合乎市场逻辑,在技术上给业界带来很多革命,产业革命的潮流任何人都阻挡不了。互联网金融对银行产生的冲击性影响是不可回避的,要处理为良性冲击。他同时表示,今年消费税改革可能有动作。

在地方债风险问题上,贾康表示,从目前审计署信息来看,总量处在安全区内,主要风险点在局部和项目上,特别是运行机制上。风险爆发是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发生突发事件,这时一般是要灭火,这种方式对政府的公信力损害比较大。

贾康认为,对于地方债的问题要客观看待,地方债兴起之时,地方政府获得的资金对各个地区贯彻发展战略和改进民生都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弊端不可回避。弊端主要来自信息不透明降低了风控能力,在未来应该强调阳光化和制度建设。

在消费税改革的问题上,贾康指出,改革有若干个相关联的目的。主要包括:首先,把消费税的可行部分推到零售环节,归地方掌握,以增加“营改增”后的地方税收,同时促进地方政府更多关心辖区内的供销两旺,而非吸引企业投资;其次,对资源环境进行调节;三是对炫耀性奢侈品消费进行调节。

贾康指出,相关部门目前正在加紧研究消费税改革方案,该项改革是今年财税改革中很可能看到动作的一项。通过调整,把一部分财力归到地方政府,把原来生产、批发环节的消费税推到零售环节。政府在得到激励之后,可以更好地优化辖区内的市场环境。